

部分作者

任玲,1966年生于云南曲靖,曲靖一中语文高级教师。曾在《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等刊物发表《语文课,给思想松绑》《梦想突围——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等论文近40篇,参编《云南省初中语文必读课本》等书。

连晓,1954年生于浙江杭州,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教研室语文教研员,语文特级教师。曾在《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审美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等论文20余篇,并参编《中级古代汉语》等书。

韩锐,1955年生于湖北襄樊,湖北襄樊四中语文特级教师。曾在《语文教学研究》《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上发表《快乐语文123》《最好的设计师》等论文10余篇,并参编《“3+X”2001年高考综合考点·语文》等书。

宋晨光,1969年生于吉林梨树,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教师。曾在《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报》等报刊上发表《“鸡鸣”“黄昏”“人定”注释求真》等论文10余篇,参与主编了《佳文派对》一书,参编《初中文言文译注赏学》一书。

屠红梅,1972年生于江苏张家港,江苏梁丰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曾在《思想理论教育》等刊物上发表《让孩子自由地梦想》等论文。

俞乐女,1974年生于浙江诸暨,绍兴文理学院附中语文一级教师,绍兴市教坛新秀、市十佳青年教师标兵,曾发表《语感训练三步曲》等论文。



主编:王为松
执行编辑:徐泽春
编辑:《语文学习》编辑部
主 办:上海教育出版社
地 址: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政 编 码:200031
电 话:(021)64373598
电 子 信 箱:seph@wxl.com.cn
封 面 印 刷:上海书刊印刷厂
正 文 印 刷: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国 内 总 发 行: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国 内 订 购:全国各地邮政局
国 外 发 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 京 399信箱
报 刊 代 号:4-253
国 内 统 一 刊 号:ISSN001-8468
CN31-1070/H
定 价:3.00元
外 国 代 号:M209

4 < 语文课程标准与语文教师 /于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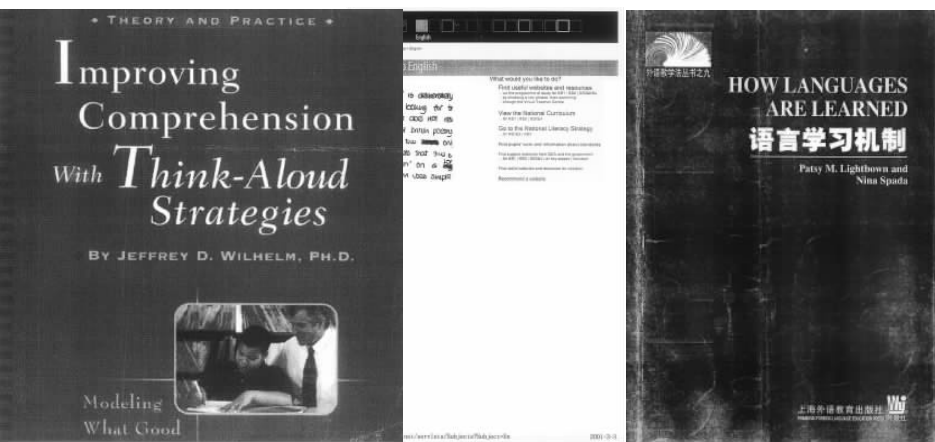
论坛

- 9 < 争鸣 | “语文意识”:语文教学的阶梯 /王尚文
11 < 真善美的批评标准不可割裂 /盛海耕
——读《“感情真实健康”辩》有感
14 < 话题 | 作文“说真话”面面观 /李海林 任玲 小马
17 < 随笔 | 浅题深问的尝试 /俞乐女
17 < 煮字 /沈晓龙

教学

- 20 < 案例评点 | 给课文换一个结尾 /张怡春 (特约主持 郑金洲)
22 < 课文视窗 | 关于《数字杂说》/宋晨光
24 < 关于《我与地坛》/韩锐
25 < 教学艺术 | 《谏太宗十思疏》:以古为鉴,修养自我 /范里
由问题深入 /连晓
26 < 《为了忘却的记念》:“原来如此!……”的潜台词 /卞志毅
27 < 备课笔记 | 古代戏曲词语辨析 /周志锋
29 < “杯盘狼藉”用法献疑 /李纪镜
29 < 《兵车行》的创作背景 /戴建华 陆精康
32 < 名作重读 | 怎样感受人? 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王富仁
——简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
39 < 写作指引 | 以诗引文的一次尝试 /屠红梅
42 < 作文题库 | 作文题设计 /周红 钟德艳 王立东
35 < 阅读空间 | 飞翔的翅膀 /特约主持 宗彦兰
43 < 旧文重刊 | 我学国文的经验 /周作人 (特约主持 赵志伟)
40 < 口语交际 | 口语交际的功能与课程的最低要求 /明洁
45 < 语言丛谭 | 从对句谈仿句的训练 /关成玉
38 < “妈妈”和“母亲”不一样吗? /阮咏梅

- 2 < 观点 特约主持 李明洁
3 < 声音
3 < 反馈 | 不必大惊小怪 /陈新
46 < 教育书坊
封二 < 与课文作者面对面 | 何为
18 < 关于《音乐巨人贝多芬》/何为
19 < 暂不封笔 /徐泽春
——拜访作家何为先生
封三 < 读书·行走 | 关于马克思的两个下午 /马莅骊
封面 < 教学图片 | 英国伦敦北郊——马克思长眠于此



观点

母常常纠正孩子不标准的讲法,希望他们能够改正。父母个人的社会语言背景也是构成这种不同程度纠错的因素。例如有些语法问题在某些父母听来并不以为过。

然而,大量观察资料显示,父母在纠错时,通常集中在意义错误,而不是形式错误。所以,他们会修正孩子的用词错误、陈述错误或者粗口,但对无碍成功交际的错误,他们往往不予理会。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儿童并不依赖于不断的纠错学习语言的基本结构(如词序、词素、语调)。

(刘韵秋 编译)

[美]《用“大声思考”来提高理解能力》

学院机构出版

Jeffrey D. Wilhelm著

“大声地”思考

Wilhelm博士指出,一个热情的教师不仅应该将读书的热情传递给学生,而且要教会他们如何去理解、欣赏和讨论各种文章。

他认为,学生们认为阅读很困难往往是因为教师低估了阅读材料的挑战性,因此他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大声思考”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声说出自己的所见、所想、所感和所做。通过这种方法,缺乏经验的读者便可以掌握阅读高手所用的技巧。

通过简短、能动、实用的课堂演示,Jeffrey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技巧,如:加强全班、小组、一对一演示背景的指示;示范阅读高手常用的技巧;监测学生的理解能力;鼓励学生从视觉上、情感上和智力上去理解文章;对学生的阅读方法进行评估等等。

(侯敏 编译)

特约主持 李明洁

[英]《语言学习机制》

Patsy M. Lightbown和Nina Spada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儿语化言语和对话中的互动交流

儿语化言语,即指成人对儿童使用的语言。我们都知道,多数成人在对儿童说话时往往简化语言,放慢语速,改变语调,将句子变得简短而且重复,措辞发生变化,交谈的话题也仅限于即时的情景。成人会重复孩子的说法,同时也会纠正他们的语法。

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有些成人不和幼儿做此类交谈,可这些孩子仍可获得社会语言技能。因而,对这种语言简化现象很难下断语。因为即使父母与孩子很少进行这种简化交流,孩子仍然可以学会语言。对语言研究者来说,这一现象表明:比简化本身更重要的是对话中的互动交流,语言娴熟的对话者对孩子说出的话马上可以做出直觉反应。这一互动交流的重要性在案例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刘韵秋 编译)

<http://www.nc.uk.net/servlets>

2003年2月28日

英国语文课程总目标和分级规定

作为母语,英语是英国国家课

程的核心科目之一。国家课程对中小学英语教学在每个阶段和在哪些方面引导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总的说来,英语教学应该保证听、说、读、写全面整合,帮助学生创造性地和富有想像力地表达自己并与他人交流,使学生成为热情的和有批判头脑的语言使用者。他们能够阅读故事、诗歌、戏剧,以及其他非小说类或其他媒体的文本,理解语言的模式、结构和使用方式,获得的英语知识能够帮助他们选择和调整在不同情境下应该说什么或写什么。

国家课程对英语的教学目标分四级水平。这些教学目标将反映学生的知识、技能和理解力。其中7岁、11岁和14岁是大多数学生达到前三级水平的年龄分界级。四级水平提出的资质要求是评价学生是否达到国家课程学科要求的主要手段。

(肖玉敏 编译)

[英]《语言学习机制》

Patsy M. Lightbown和Nina Spada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父母的言语纠错

父母会纠正儿童在语言表达中出现的错误。对于学前儿童,父母很少评论语法错误,但是会指出礼貌疏忽和用词错误;对于学龄儿童,父

●我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就会看到和听到没有个性、千篇一律的表达和表述。这些语言就是我们从小沿用下来的、装饰过分的、拖泥带水的套话。这些文字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情感夸张却没有真情实感,不停地强调什么却让人在麻木中忽略了它的本意。

——这就是存在于我们语言中的恶习。而简练和节省、准确和朴素才是最美的。(《文汇报》2003-1-24)

●过河拆桥学作文。

——为了帮助学生快点进入写作状态,广西南宁的袁刚老师自创了“图示快速作文法”,颇见成效。不过,这毕竟只是“术”而非“道”,只是“过河”的“桥”,所以袁刚老师自己也说,只要过了作文起步这条“河”,

尽可以“拆桥”无妨。(《中国青年报》2003-1-24)

●“新概念”还在路上。

——“新概念”作文大赛5年了,如今也面临着被琢磨命题、研究评分标准的尴尬,甚至有的地方还开设了考前辅导班。这样,“新概念”岂不又变成遵循某种程式的“旧概念”?在回归青年、回归文学的路上,“新概念”任重道远。(《新民周刊》2003-2-3~9,第5期)

●语文考试分阅读理解和写作两部分,阅读理解内容主要取材于教材之外,写作一般不搞命题作文。

——这是《潍坊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招生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关于语文学科的具体方案,目的在于取消死记硬背性质的题目。(《中国青年报》2003-2-20)

●不要“基本对”。

——当你满腔热情地回答了别人的问题,却只得到了“基本对”“基本上正确”“基本上可以”的评定,感觉如何?所以,别这样对待你的学生,好吗?(山东单县师范学校万继允老师来信)

●听我背!

——一老师教完《天上的街市》,还余7分钟,就对学生说“听我背!”学生顿时情绪高涨,个个全神贯注听老师背。受到老师的感染,没几分钟学生们竟然也都会抑扬顿挫地背了。这老师真棒!(山东单县师范学校万继允老师来信)

●只有学外语的时候才要练耳朵吗?

——错!学语文的时候,练耳朵同样重要。练好了耳朵,记得牢、观察得细、概括得精、判断得准,交际能力自然会得到提高。(重庆女子职业高级中学金鸿老师来信)

不必大惊小怪

《如此大题目谁论?》(2003年第2期《语文学习·声音》转摘自《文汇报》)惊呼以《论人治与法治》这样的题目给初中二年级的孩子做,是“教育者不懂教育规律”,是“忘了拔苗助长的教训”。笔者却恰恰以为不必大惊小怪。先请看下面一组题目:

《吴蜀论》《汉明帝好佛论》《武侯治蜀王猛治秦论》《张良贾谊合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富弼使契丹论》《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杨氏为我墨氏兼爱说》《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论》《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天年主人之雁

以不材而死试申其说论人》

这是从两本作文本32篇作文(一学年规定要写的篇数)中随便选录出来的一些篇目,有史论,有时论,有修身论。文章写得怎样?只要看教师“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扬扬(洋洋)千言,宛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笔亦开拓,文笔流畅”“至论,至论”等批语即可知。(惜文长不能录)作者名叫沈雁冰,十二岁,其时是浙江桐乡乌镇高等小学的学生。

社会的开放,网络进入千家万户,连着五湖四海,今天的孩子与一个世纪前的孩子已不可同日而语,对孩子的思考能力,学习与运用语言的巨大潜力,“我们过去是严重地低估了”,“今天的孩子

的‘生活世界’并不像我们成年人想当然的那样狭窄与单纯”。(钱理群《孩子发出的警示》,2003年第4期《读书》)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们近邻的日本,在中小学时期就让学生们纵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战争与和平等天下大事。如果我们只是把孩子的眼光局限在春花秋月、身边的喜怒哀乐等等小事,就会使孩子变得目光短浅,胸襟狭窄,那样是适应不了全球化的大趋势的。外国的中小学生能写这样的题目,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小学生能写这样的题目,今天我们的中学生难道不能写《论人治与法治》?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者教什么,怎样教!

苏州 陈 新

语文课程标准与语文教师

于漪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即将公布,令人欣喜。它是在做了大量的前期调查研究工作,广泛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探讨、筛选、提炼、研制后诞生的,充满了改革意识与创新精神。我无能力对它作较为全面的解读和评述,只能从一名历经语文教育风雨的教学第一线教师的角度,谈一点学习的肤浅认识和体会。

研制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学生进行长达12年语文教育的依据。人的语文素养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终身发展的基础。因为人的语文能力是构成人学习能力的基本要素,而学习能力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之一,语文能力、语文素养陪伴人的终身。基础教育中语文课程改革与其他学科改革一样,是大事,关系到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的成长,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高低,具有战略意义。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制订与义务教育的衔接,非少数专家的主观臆断,而是源于这样的基础:千年的民族文化积淀,百年的曲折探索,世纪末的规模宏大的讨论,新世纪社会需求的思考。我的认识是:

一、价值与意义

通读课程标准,把各个部分前前后后联系起来思考,形成了一个突出的印象,即:在新世纪重构语文教育模型。这个教育模型就是:“素养——养成”。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整体素质在学习过程中养成和提高,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充分发挥。这种教育模型的构建,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究。

纵向继承。继承传统语文教育中行之有效的合理精华。不是在“零”的基础上重新砌炉灶,以期标新立异,炫人耳目。千百年来,语文教育在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学生文化素养,增添文化积淀方面创造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回顾,审视,取其合理精华为我今日所用。如诵读,感悟,涵泳,体味,积累等诸多方法,都反映了尊重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习起到良好作用。重视继承,并不是回归传统走老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有巨大差异,无论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等,均不可能等同,如若刻舟求剑,必然行不通。

横向借鉴。借鉴国外教育、国外母语教育的先进理念与有效做法,吸取养料,为我所用。国外许多教育专家、学者提出的种种学说都聚集在“如何培养现代化的人”上。这个理念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教育,说到底还是培养人。把学生从自然的人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是教育应负的责任。然而,我们却常常忽视教育中这个首要问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术轻人,重技能技巧,轻人总体素质的培养,把“人性”置于“技性”或“物性”之下。而今天的课程改革,一改以往以知识为本、以知识体系为本为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本,这种对人的尊重,对学生的尊重,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这种变革应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教育,应是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学生要成为人力资源,当然要促进发展。

国外母语教育在培养学生文化构成、公民意识、价值观形成以及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不断进行研究,使之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在20世纪末,曾开展大规模的“阅读挑战”,组织100万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提高阅读能力,增添文化底蕴;动用了10万名大学生半工半读,帮助中小学生提高。据1999年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显著提高、文化构成明显改善。这是为进入21世纪适应时代发展而做的一项教育准备。又如,美国劳工部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本国教育现状及21世纪社会对人才素质需求全面调查,深入研究,提出就业人员应具备五大能力和三大基础。三大基础指:能力基础——有较高的读、写、算、听、说的能力;思维基础——能进行创造性思维,有决策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想像能力、学习能力和推理能力;素质基础——责任心,自尊心,善交际,能自律,为人诚实正派。这些显然是综合素养的要求,与基础教育、母语教育密切相关。

其他如建构主义理论、对话理论、后现代课程理论等对语文教育的改革均有相当的启发。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要筛选,判断,消化,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学习别人,绝不是丢失自己。

植根于汉语文本土,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汉语言文

字特别具有灵性,创造的空间特别大。它是具象的,灵动的。由于字由形、音、义构成,学起来可左右脑并用,因形求义,因声求义,打开书本,如步入画廊,兴味无穷。与“单脑文字”拼音文字比,在开发智力、陶冶情操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汉语的文化性特别强,词汇和词组系统蕴含的民族文化非常深厚,审美的矿藏十分丰富。遵循汉语文的特点与规律,课程标准从前言到目标到实施建议,渗透了母语教育的特点,注重语文应用、审美能力的培养,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课程标准强调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促进学生有个性地发展,注重探究能力的培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评价的目的、基准、功能、多元化的阐述,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教师和语文课程同步发展等,无不贴近当代生活实际,无不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鲜明的时代特征。

针对语文教育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弊端,弘扬人文。任何语文教育模型的出现都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我国经历过“知识——传授”“能力——训练”等语文教育形态的潮流,它们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起过积极的作用。当告别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年代,学生对知识的渴求犹如久旱逢甘霖,知识传授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学语文的需求。然而,很快我们发现教育不是培养学生成为书口袋、书橱,他们要有理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培养学生读写听说能力就成为语文教育的主潮流。能力怎样形成呢?通过训练。在当时而言,应该是一种进步。回顾走过来的路,有两点值得深思。一是任何一种做法不可能只有利没有弊。把握“度”,透视底里,至为重要,超过“度”就“枉”,真理超越一步还会成为谬误。语文能力的形成要通过读写口语交际的训练,本在情理之中,而题海、题库,连篇累牍的机械操练,再伴以商业炒作,高利润驱动,除了贻误学生青春,已无学理可言,语文教育遭到了变异。二是科技发展,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一样,学科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别的不说,就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也令人惊讶不已。弄清摄影术原理到制造出照相机,花了112年,电话仅用了56年,电视更缩短,仅用12年,太阳能电池仅2年。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对教育就提出了挑战。社会经济正进行变革,知识经济初现端倪,这种经济类型建立在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交换、知识的分配、知识的使用和知识的消费基础上,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教育是知识生产力。社会不是以某种能运用的技术为基础,而是以整个知识进步为基础。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主要不是看某一方面的技能运用,而是看人才的整个知识结构、容量、水平,知识积聚和更新的能力。显然,人的培养不以获取知识为惟一目的,而是要全面

发展,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用先进理念审视语文教育现状,就会发现许多问题、许多不适应乃至相违背之处。比如学语文的目的,相当程度是为考而学,教师又不得不为考而教;学习过程尤其是毕业年级,几乎是机械操练笼罩,学生不读书不体验不积累的,比比皆是;效果不如人意,总体水平不高可想而知,相当数量学生对语文无感情,有的几乎是胸无点墨,一问三不知;喜欢语文的爱好文学的,面对标准化试题往往一筹莫展,个性化发展受到制约。语文教育失落了育人的灵魂,偏离了语文固有的规律,学生不爱学、不会学、学不好,应在意料之中。作为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在有些学校落到“小三子”“小四子”“小五子”的地步,由于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立竿见影,地位可想而知,这不能不说是悲哀。教师并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有思想的优秀教师,“置身于考试的漩涡之中,内心充满了矛盾与苦闷”,“我不想做一个没有头脑和主见的匠人,可是现实的压力又驱使我机械地服从,去做一些我怀疑的事情,甚至是莫名其妙的事情”,“语文,本该是让心灵和意志得到最自由舒展的学科,可是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了。它消磨了众多青年师生的时间和青春,更可怕的是,它正在以一种悄悄的,从而也是残酷的方式,把一个个头脑变得标准和麻木”。读了这些发自肺腑的心声,我作为一名老教师,心中一阵阵震颤。为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为了优秀教师的健康成长与涌现,语文课程非改革不可。

综上所述,可知制订新语文课程标准非主观臆断,而是由于:

1. 教育本质的呼唤

教育事业是具有理想性的事业,教育本质是增强人的精神力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用“洞穴中的囚徒”隐喻说出了教育的真正含义:“真正的教育”是引导人,引导人的灵魂、精神达到真实之境,从黑暗引向光明,从意见世界引向真理世界。这种灵魂的牵引实际上就是人生境界的提升;知识、技能是帮助灵魂攀升的阶梯。我国的《大学》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习的目的,在于彰明内心美善的德性,在于使人自新,使人处于最美善的道德境界。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也就是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尚。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的池田大作关于21世纪的对话中谈到当代教育时,认为教育的本质不应以谋利为动机,而更应寻求存在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之间的心灵交流,开启人的心灵与富有的大脑。显然,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使教育对象受教育的长度增加,即实施终身教育,与此同时,不能忘记教育

的深度,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教育本质呼唤课程制订必须对学生的成长负责。

2.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现实需要

要造就新一代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念,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教育的浅层次价值观是教育个体发展过分注重对谋生、谋取物质利益、博取功名的追求,忽视或轻视个性充分发展及高尚境界形成的深层次价值。学校教育要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全面发展是教育方针所规定的,也是实施素质教育最本质的反映。人的生命体本身蕴含着多方面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学生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学生都能得到发展,不仅是民主的基本理念,而且是每个学生的基本权利,学科教学要保护并尊重这种权利,并创造条件实现这个权利。课程标准排除片面教育质量观的干扰,不停留在浅层次的价值观,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现实需要。

3.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社会要求学校向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培养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等对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毕竟这些只是空的躯壳,关键在于运用的人。只有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才能使行进的、移植的东西有生命力,在自己土地上开花结果,才能保证社会现代化。优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各学科教育的高质量。因此,语文课程调整目标和内容,变革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当然就责无旁贷。

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从语文本身的特点出发,抓住了教育的本质,着眼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适应时代的迫切要求,在当今学校教育中确立语文的育人价值与意义,使语文教育健康发展。对学生和语文教师而言,应该说是一个福音。

二、核心与支柱

语文课程标准从理念到设计,从目标到实施,有许多突破性的进展,我认为它的核心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课程的具体目标由此生发开来。这个核心有三根支柱支撑,这三根支柱是:“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根支柱构成语文教育的立体空间,三者整合,交融,贯穿了课程标准的各个部分。

1.体悟内涵

语文素养的支柱之一是“知识和能力”。不言而喻,语文学科要传授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对这,语文教师可说是轻车熟路。然而,课程标准所指的

“知识和能力”不是繁琐、割裂、支离破碎、机械重复的再现,而是对以往的运用正确的教育理念筛选,提炼,取其精要加以整合。必修课程中“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21条目标,选修课程中诸多学习的目标,其中不少阐明了这方面要求。学生在五个方面应获得发展——“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语文能力培养方面众多,而用“应用”来总拎,简明扼要,尽在不言中。

“过程和方法”是语文素养的又一支柱。与其他学科教育一样,以往往往重结论,轻过程,重教法,轻学法。这对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个性发展均有相当的约束。语文教育本身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生学、思、议,学生读、写、口语交际。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教学情境必然是生动活泼的,学生于其中不仅增长知识,增强能力,而且智力获得发展,情感受到熏陶。局囿于现成结论的抄写、背诵,是绝不可能收到如此良好效果的。须知,从静态的维度看,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从动态的维度看,知识更是认知的过程,是探求知识形成的过程。重视教育过程,学生能充分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在探求知识、寻求结论的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学语文。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表面理解,要深入一点,广泛一点。情感,既指学习动机、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的激发,更指内心体验的注重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态度,既指学习态度、学习责任心的培养,更指求实的科学态度、乐观的生活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既要考虑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又要考虑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还要考虑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强调它们之间的统一与和谐,追求真善美的境界。情感、态度、价值观,犹如心灵世界的连锁链,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三根支柱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渗透、融合,构成语文教育丰富多彩的整体。

2.把握实质

核心与支柱的确立,由语文课程的特点所决定。

对语文课程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说得最多的是工具性、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文化心理特征,是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离开意义,符号就不成其为符号。因而,它不仅具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二者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没有人文,就没有语文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

掌握语文这个工具。通俗地说,语言文字是“表情达意”的,把“表”“达”与“情”“意”割裂开来,或厚此薄彼,厚彼薄此,乃至只承认此不承认彼,又怎能算是语文呢?语言是生命之声,语言活动是生命的活动,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表“情”达“意”,离开了“情”和“意”还有什么语文可言?谢慧英先生说得好:“母语的学习必然承载着这些历史的、人文的复合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精神世界。因此,从长远看,语文教育应承担着改造国民素质、重铸人文精神的重任。认识语文教育必须超越实用主义的局限,从精神的拓展、从人的发展的高度去把握,才能领会语文所包蕴的丰富的内涵。”(《叶圣陶语文“工具论”评析》,《语文世界》2000年第4期)这段洞悉事物底里的论述符合时代的潮流,符合世界许多国家母语教育的走势,有助于加强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

其实,语文教学中教育性的问题并非是什么新课题,并非是别出心裁想出来的,更不是要语文负载外加的累赘。语文育人的优秀传统且不说,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教学目的”中也这样表述:“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在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也有类似的表述。只是在教育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如升学考试等影响与干扰,把第一句话推到极致,丢掉了第二句话。而正由于对后者的忽略与丢弃,前者的预期效果难以实现,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人们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的。从语文应担负的目的任务提高到学科性质的认识不能不说是思想的飞跃。这种思想的飞跃基于先进教育理念的冲击,语文学科本身的发展,大量教育实践的反思,社会发展的需求,国外母语教育的借鉴,其中学理的探求,反思的苦痛,利弊得失的权衡,非语言能一下子表述清楚。但是,它清晰地表明,这种性质的界定是有依据的,它坚定地着眼于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科学地遵循语文蕴含的固有规律。抓住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教师的思考从线性走向多维,语文教育全盘皆活,就能以其丰富性哺育学生成长。学生在语文素养养成与提高的过程中,既获得了扎实的语文基本功的培养,又获得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熏陶,潜在能力、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开发。

三、实践与探索

课程标准的诸多理念、做法要在教材中得到体现,

教材编写者不仅要认真学习,具体领会,更要创造性地实施。教师要依据课程标准进行教育,当然须有学习理解的过程。理解得越深,自主性越强,越能有创造性,越能取得良好效果。

认识指导实践,但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实践与探索,不仅有助于对理论的认识与领悟,而且能丰富乃至修正认识。当前的语文教育恐不应等待新编教材出来才改革,而是应以课程标准的精神为指导,进行有目的的实验,提高认识,积累经验,逐步改变语文教育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被扭曲的状况,是否可先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 牢固树立以促进学生为本的思想

李政道先生在讲述学校西南联大办学功绩时,深情地说:“西南联大是以培养人为中心的。”应该说,“培养人”三个字道出了教育的根本,掷地有声。然而,办学者、教师真正做到却绝非易事。见“技”不见人,见“分”不见人已司空见惯。学科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教育过程是培养人,知识技能是培养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的成长不可或缺的阶梯。“手”是属于“人”的,不能说“人就是手”或“手就是人”。

要目中有人,树立以促进学生为本的思想,须注意解开三个思想疙瘩。一是外塑与建构的问题。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的质量如何、语文素养如何,不能只靠教师外塑,要靠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任何高明的教师不可能代替学生学习,代替学生成长。学生的认知离不开他已具备的知识基础、能力基础、学习与生活的经验。学生的认知过程就是学生认知结构在认识与实践不断主动建构的过程。教师确实不能包打天下,而且也包打不了,教师施教之功是调动他们学习语文的内驱动力,促进他们发展。二是师生定位问题。学生是活泼泼的生命体,不是无生命的容器,任凭灌输;教师不是语文知识、语文能力的二传手、搬运工。要让学生走进语文,不是只听客观介绍,隔墙看花。《牡丹亭》里杜丽娘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确实如此,“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溜的圆”,不亲目睹,亲耳闻,怎会有亲身体会?如历其境与身历其境是有极大差别的。学生应亲历语文之境,进行语文实践,提高语文能力,加强语文素养。教师是语文教育的组织者、指导者、启发者,既参与,又指路,有时也可领跑示范。三是少数尖子与全体学生的问题。尊重与爱护学生是新世纪教育改革的新起点。脑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每个常人身上蕴含着有待开发的巨大潜力,这是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每个学

生语文素养的前提与依据。人是多样性的,在智能方面往往各不相同、各有所长。学生有差异,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教育者对学生的个体性、独特性、多样性应给予充分的尊重。要提高全民族素质,就不是只培养好少数,而是要面向全体学生。不是让所有学生适应“标准化”的语文教育,而是语文教育通过自身的改革,以其丰富性、多样性去适应与满足学生的需要。

解开思想疙瘩,师生也就逐步从技术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按照人的发展规律与语文教育规律去学语文,教语文,师生都有了自我发展,有了自主教与学的空间。

2.掌握语文教育个性特点,发挥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

较长时间以来,语文教育的实用功能受到十分重视,并采用多种方法加以落实,而对它的发展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既缺乏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认真落实。从这次课程改革的前期工作调查研究来看,课程目标在学生身上的体现是:有较好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平、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较差,这不能不说是学科教育的缺陷,语文作为育人功能独特的学科,当然不能推卸责任。

语文由于其个性特点,在培养学生的任务中必然有多重功能,总是在于教师意识到没有,施教时有无自觉性。

语言的发展与人的成长、发展密切相关。语言是人的重要智能,语言的发展能很好地促进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思维力、创造力的发展。语言和思维、情感同时发生,语言规范、生动、严密、流畅,思维的敏锐性、逻辑性能获得锻炼与发展,情感也会日益丰富。进行语文教育,紧扣语言文字特点,开发学生智力,激发学生情感,只要重视,发挥发展功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语文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语文教材中精选的优秀诗文、经典名著都诉说着一定时期的文化,表现特定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引导学生阅读它们,就是让学生穿越时空,和圣者、智者对话,和先驱者、跋涉者交流,感受伟大的心灵、深邃的思想、超凡的智慧和创造的力量。文情并茂,文质兼美,进行语文教育,带领学生在咀嚼、品味丰富多彩的语言材料的同时,必须在“情”“质”上下功夫,发挥语文熏陶感染的功能。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既感受、体验到语言文字表达情意的表现力、生命力,又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有利于开阔视野,提高审美情趣和精神品格,形成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多元文化并存,外来扩张文化冲击下,母语教育更要坚守育人的重任,以丰厚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哺育学生健康成长,培育民族自信

力,铸就一颗中国心。

发挥语文课程多重功能,既由语文性质所决定,又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必由途径。它能去除教学中的“匠气”,展现人师的天职。

3.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时代的呼唤,有个性地学习的需要,是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这样的新的学习方式,首先须清醒地认识:信息化社会来临之际,信息急剧膨胀,新知识新技术如潮涌,学生在学校学习,不可能掌握与储备日后必须用到的众多知识与技能,学校教育只能精选他们终身发展必备的基础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学会学习,具备获取新知识新信息的能力。语文陪伴人的一辈子,书是读不完的,关键在培养学生求知的浓厚兴趣与内在动力,激发他们酷爱读书,指导他们学会读书。学生如果没有主动学习语文的态度,不会自主地阅读、表达、学会学习,就不是真正学会学语文。

其次,要着力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是这种学习方式的基础。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师傅引进门,修行在自身”,学生在语文天地中遨游,辨别、品尝、探源、究根,心灵解放,能量释放。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以往的灌输与接受,指令与服从。

应该说,教师的语文素养总体是超过正在求学的学生的,但教师不可能全知全能,在每个方面都超过学生。平等对话,思想碰撞,就会溅出火花。学生有差异,当思想高度集中时,有些就能超水平发挥,不仅同学之间受鼓舞,教师也会深受启发。

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脑力劳动过程,教师与每个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平等对话,共同琢磨讨论,学生的发现能力、质疑能力、思考探究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就会得到有效的锻炼,文本阅读、学习就不会浮在表面,而会纵向深入、横向扩展,形成发自内心的独特体验与感受。新的学习方式一旦建立,课堂上就会形成思想、知识、情感、能力、态度、价值观等交流的网络,在合作、探究过程中,学生加大了选择性,常会出现“神来之笔”,令人振奋。开辟了个性化学习天地,课堂上就不只是一个“发光体”——教师,而是“能者为师”,每个学生都会发光。学语文成为一种生命的活动,充满了激情和智慧。

语文课程标准内容丰富,理念先进,留给教师极其广阔的创造空间。深入学习,在实践中尽心探索,必能使师生深受其益。

(本文依据作者在刚刚结束的“语文学科教学论教师国家级培训”华东师范大学培训班上的讲话整理。)

“语文意识”：语文教学的阶梯

王尚文

记得在中师读书时，一次上心理学课，总是笑咪咪的汤老师笑咪咪地提问道：“你们在二楼的这间教室里上课都快两年了，谁能告诉我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一共有几级？”教室里一片静默，谁也没有举手。——这楼梯我们不知走过多少回了，可谁也没有去数过它到底有几级。我惶惶然低下了头，生怕汤老师点到我。可他偏偏点了我的名。当时尴尬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虽然都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

原来这是汤老师上“注意”这一章的得胜头回，藉以引起我们对“注意”的注意。是的，不去注意，即使天天在你眼皮底下的事物也有可能无所觉知。由此，我想在读写听说活动中，对语言文字是否也会仅仅把它当作上楼的楼梯而不去特别留心呢？请看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的一段回忆：

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令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彩妥帖，心里所要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一般人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

我把朱先生后来这种对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自觉关注称之为“语文意识”。从表面上看，朱先生所谓“语文”是指语言文字，其实他指的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及其结果，质言之，是言语而非语言。以读为例，当我们面对某一文本时，是飞上楼梯直奔内容呢，还是“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这是语文教学的第一个岔路口。说写者做到语文的精确妥帖，听读者感悟语文的精确妥帖，

是良好的语文素养的标志。而它所需要的“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无不渗透着人文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源自读写听说活动中对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自觉关注，即所谓“语文意识”。沿着语文意识，语文教学就走上了形成和发展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正确轨道；否则，语文教学就会变味甚至变质。

只有读，你才会读；只有写，你才会写，这当然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但学习读、写得法与否，效率就有高低之分。如果我们有自觉的语文意识，多半就有事半功倍之效；倘若只是把语文当作“过河的桥”，语文方面的长进就会大受影响。我有一个亲戚问我如何提高他孩子的语文水平，我随口答道，鼓励他多读书吧。谁知亲戚大不以为然，说，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他都看过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还不止一遍，用于读书的时间比别的孩子真的多多了，可语文水平还是远远不如别人。——其症结大概就在于他在读的过程中缺乏自觉的语文意识。

如果缺乏自觉的语文意识，则人们对于文本的内容，即“它所写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往往也难以准确、全面、深入地加以把握，因为言语内容生成于言语形式，言语形式实现言语内容。我们甚至可以说言语形式就是言语内容。没有自觉的语文意识，读时所摄取的内容未必准确，更未必全面、深入，往往大打折扣，甚至误会曲解。如《药》中的康大叔明明说夏瑜“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花白胡子就错听成是夏瑜说自己被打得可怜，其实康大叔的话上句明明已经说清夏瑜“打不怕”，下句领头还有一个“还”字，由此可以断定“可怜可怜”说的是阿义，起码不是他自己。难怪“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样子”，尽管看他不上原因不是他认为花白胡子缺乏语文意识。这是误会曲解的显例。再看更为常见的大打折扣的现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第一段是：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不少人对最后一句中的那个“却”字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有有的教师也是熟视无睹，“难得糊涂”。其实这个“却”字蕴蓄着作者极为强烈的愤慨之情；前面两个事实，尽管不能据此而得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结论，毕竟尚可理解，正如下文所说，信“地”信“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虽渺茫，寄予一点希望也还多少有点道理，而“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可就荒谬绝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却也是事实”。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却”字到了鲁迅先生的手里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支尖锐的投枪，把握这个“却”字，就可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先生思想感情的脉搏，可谓一字千金，一字千钧，把它给落下了，可谓疏陋之至，是对不起作者的。确实，“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朱先生说得“不含糊，也不夸张”，非常“精确妥帖”。我们常说语文是学好其他各门功课的基础，就是由于阅读其他各门功课的有关书籍也必须具有自觉的语文意识，关注它到底是怎么说的，即如何运用语言文字。只有关注“怎么说”，才能准确把握“说什么”。只是其他各门功课的教学聚焦于“说什么”，而我们语文教学则聚焦于“怎么说”，以培养语文意识为自己的天职，并以此为起点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

语文意识关注的是言语本身的物质存在，就是要认真听听它的声音，辨辨它的色彩，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体温”，把它摆在它和整体的关系之中，摆在它和语境的关系之中反复审视、掂量、咀嚼、玩味，从这里出发走上正确的语文学习之路。语文意识，虽然并不就是语文素养，却是语文素养所由生成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也是语文课程进行人文教育的独特途径和优势。因此，我认为语文意识是语文教学的阶梯。离开了语文意识，语文教学就会寸步难行，或走入歧途。

我最近看一篇教育硕士的毕业论文，是讲教材编写的，其中引用了雅斯贝尔斯“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这一观点，并接着写道：“属于人文学科的语文教育，则更加触及到人的精神、人格、灵魂。选文要突出以人为本，重在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是以教养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的人为首选教育目标。所选文章要教人习语，教人学会读书、作文外，还要教人学会做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真人。”它把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分成“教人学会读书、作文”与“教人学会做人”两项，而且两者似乎可以相互游离，这显然有待商榷。“教人学会做人”，对于语文学科来说，应当渗透于“教人学会读书、作文”之中，而教人学会读书、作文，首先应当养成学生自觉的语文意识。我十分佩服两位语文

老师的有关实践。一位在教《荷花淀》时，讲到水生从区上开会回家与妻子的对话这一段，他问学生，水生把参军的事告诉妻子后，水生嫂回答说“你走，我不拦你。可是家里怎么办？”这个句子里句号能不能改成逗号？请读一读，比一比，想一想。——问得实在太好了！他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首先关注“语文”。经过一番比较，学生回答说，如果改为逗号，那么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是假，以“家里怎么办”拖他后腿才是真；采用句号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水生嫂深明大义，由衷支持丈夫参军；另一方面又需要丈夫的理解，需要丈夫的爱怜。何况他参军后家里的事确实会有困难。前者刁滑，后者温柔而多情。他让学生从这里逗号和句号的不同，感受到两种人格的分野。一位在教《守财奴》时，问学生：葛朗台称赞女儿为什么说“你真是我的女儿”，而不说“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他早就估计到学生对这类句子往往容易犯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毛病，似乎懂了，实则尚未入门。经过启发，引导，学生终于明白了葛朗台并非一般地称赞女儿“好”，而在赏识女儿像“我”，像“我”一样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拿去交易。葛朗台只会说“你真是我的女儿”，而不会说“你真是我的好女儿”。这位老师通过这么一问，让学生真正深入到了葛朗台的内心世界，窥见了它的丑恶，一石双鸟，同时收到语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良好效果。我佩服两位老师清醒敏锐的语文意识，更佩服两位由此而达到了语文和人文水乳交融的境界。语文教学就是要从一个个标点、一个个词语、一个个句子开始构建或更新学生的言语世界，与此同时构建或更新学生的人文世界。雅斯贝尔斯说的没错，但他说的是一般的教育。具体到语文课程，它正是通过如何运用语言文字这一有别于其他课程的特殊途径使自身成为“人的灵魂的教育”的。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舍人文而求语文，那当然是缘木求鱼，因为语言文字的运用绝不仅仅是个运用语文的知识、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和思想、情感、个性等人文因素密不可分的。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深刻的相关性。但矫枉不能过正，舍语文而求人文，同样也有语文、人文两失的危险。语文以人文为灵魂，失去了人文这一灵魂，语文必将成为行尸走肉；但人文只能包括而不能取代语文，人文毕竟并不等同于语文。和政治、历史、音乐、美术等其他人文学科不同，它只能寄寓于语文之中，它也因而而具有了自己独特的优势。把它从中抽出来，即使强调到首要的位置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将语文与人文有机结合起来的枢纽正是语文意识。由衷祝愿语文教学经由语文意识之梯而更上层楼！

真善美的批评标准不可割裂

——读《“感情真实健康”辩》有感

盛海耕

《语文学学习》2002年7、8合刊刊登的吴俊苓老师的文章《“感情真实健康”辩》，值得一读。它提出了事关作文教学乃至整个语文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善”的存在价值问题。它的呼之欲出的结论是：在“真善美”的衡人论文批评标准中，“善”是无足轻重、碍手碍脚、有不如无、应予抛弃的。它混淆了本色的感情健康观与被长期左倾教育所歪曲了的感情健康观。从这种混淆出发，它提出了“真实——就是健康”“健康不能成为评判作文优劣的标准”“作文无法检验学生思想感情的健康与否”“检查学生思想感情健康与否不是作文的任务”这四个观点。下面我对这些观点谈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语文教育界的师长和朋友们。

情思健康是“善”的起码要求

情思健康“不能成为评判作文优劣的标准”吗？否。

评价任何人、任何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真善美的统一。

真善美之中，“善”的内涵是什么？善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符合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的肯定性评价。它的对立面是恶。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思想感情、言论行动、道德品质，例如勤劳、善良、节俭、勇敢、诚实、友爱、正直、同情弱小、乐于助人、追求真理、自我牺牲、爱祖国、爱人民、爱地球、爱人类、人格独立、思想自由……都是善；反之，则都是恶，如好吃懒做、阴险、残忍、奢侈、怯懦、虚伪、妒嫉、势利、恃强凌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见利忘义、忘恩负义、卖国、卖友、专制、糟蹋大自然、损公肥私等等。

同是善，同是恶，那善恶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四个孩子面对一只受伤的小鸟，甲把小鸟捧回家，替它养好伤然后放飞它，这孩子的心灵是美好的；乙可怜这小鸟，同情它，怜悯它，虽然没想到如何进一步帮助它，但这孩子的心灵是健康的；丙冷漠得很，无动于衷，这孩

子的心灵就不够健康；丁残暴如侵华日军，抓起小鸟就往石板上摔，直把小鸟摔成肉泥，然后满足地扬长而去（我曾在杭州灵隐亲见这一幕），这孩子的心灵就是恶的。四个人面对一个贪污腐败五毒俱全的贪官，甲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连自己的生命安全也置之度外，甲的心灵是高尚的，具有崇高美与悲剧美；乙虽然没能像甲那样嫉恶如仇、大义凛然地与贪官斗，但瞧不起贪官，反感他、鄙视他、厌恶他，乙的心灵是健康的；丙觉得贪官不好，但又羡慕贪官权大钱多，要怎样享受就怎样享受，生活过得舒服，丙的心灵就不大健康；丁对贪官艳羡之，巴结之，与之同流合污，恨不得取而代之，丁的心灵是霉烂的、恶的。完全可以这样说：健康的思想感情是“善”的起码的要求，是一切美好的、崇高的、伟大的思想感情的基础。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全国高考“考试说明”把思想感情的“健康”作为作文的基本要求提出来，正是十分合适的。这个要求既不太高，也不太低，大有益于引导青少年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如果连情思健康这个起码的要求都放弃了，那是误人子弟，是对祖国前途、人类命运的漠不关心，是教育工作者的严重失职。

“真实”不等于“健康”

“真实”的思想感情一定是“健康”的思想感情吗？不一定。“真实——就是健康”这个命题不能成立。

我看过一些中学生的文章，得到种种印象。其一为：现在的青少年，“能写写的”倒是不少，可惜的是，是非观念模糊、道德观念薄弱的也不少。

有篇文章，写“我”在小学里当班长，而“她”只是个小组长。进了中学，她“窜”上去了，入了团，当上了班长，我却只是个小组长。“看她美的，又是升旗，又是主持班会。有什么了不起？想当年还不是我的手下？”

有篇文章，写有些同学多次考试作弊而安然无恙。“我”只作弊一次却被老师发现了，于是感叹“成功需要

机遇”，机遇不好，“再努力也是白费劲”。

有篇文章，写“我”一心想考上重点高中而竟考不上，平日比我差的同学倒考上了，我怎么也想不通，“我简直巴不得地球毁灭”！

这些文章的思想感情都是真实的，但也不同程度地都是不健康的。

青少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就是已经“成熟”的成人，谁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不健康的情思？关键在于引导。要敢于引导，善于引导。而为了引导，首先得正视现实，不要神化学生。

吴文认为：“作文展示的是学生最真实的生命体验，感情感性不带一丝虚伪和矫饰，这就是健康。”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你怎能断定凡学生写的文章必“不带一丝虚伪和矫饰”因而必定“健康”？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学生都是社会人，凡社会人都得食人间烟火，凡食人间烟火者无一例外都有可能犯凡人的错误，遑论会有不健康的情思。事实上，吴文不止一处谈到这种可能和事实。“作文的过程是成长中的学生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迷茫、有矛盾、有不正确的思想”，“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生现实，他们的思考难免幼稚、难免偏激”。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讳言学生作文中会有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第二，学生心里想什么笔下写什么，不管想的是对是错，是高尚是卑下，都如实“倾吐”出来，这种诚实的为人文的态度，是健康的、正确的，应该肯定，应该提倡；但是，在这种态度指导下“倾吐”出来的内容（思想感情），却可能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有善的有恶的，有美的有丑的，不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吴文的一大失察，正在把学生作文的态度和学生文章的内容当作一回事。

真善美三者，各有独立的内涵，但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单独取其一项做标准，无法衡人论文。三者之中，“真”是前提，离开了真，一切都无从谈起；有了真，紧接着就得有“善”。真善结合在一起，“美”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善，“真”这东西在有益于人类或有害于人类这个叉路口，就可能迷失方向。学生作文也不可能不受这个根本规律的制约。“真实”与“健康”之间不能划等号，就是“真”与“善”之间不能划等号。

放弃作文情思健康的要求 无异取消语文的人文教育

“检查学生思想感情健康与否并不是作文的任务。”

谁也不会把作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看成是为了“检查”学生思想感情健康与否。这样表述太可怕了。在正常的政治气候下，作文教育不至于扭曲到如此程度。我想这是作者的辞不达意。另外，“作文”后面应加“教学”二字。尽管有这样两处语病，吴文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学生作文思想感情健康与否与作文教学所担负的任务无关。为了行文的方便，姑称这为“无关论”。

“作文无法检验学生思想感情的健康与否……文章与做人并无必然的联系。”为了行文的方便，姑称这为“无法检验论”。

“无关论”否定的是通过作文教学培养学生健康思想感情的必要性，“无法检验论”否定的是通过作文教学培养学生健康思想感情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作文教学的人文教育任务，就被全盘否定了。作文教学与阅读教学各占语文教育的半壁河山，它们的性质和任务是完全一样的，区别只在一为输出，一为输入。既然输出的东西（学生写的文章）可以不管情思的健康与否，则输入的东西（学生读的文章）情思健康与否自然也就用不着操心了。这样一来，关注整个语文教育的思想感情的健康与否，就是庸人自扰，纯属多余了。

这样违背常识的观点，不要说出现于“语文是人文学科”已成普遍共识的今天是令人惊诧的，就是出现于古代，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在我国，2500年前的孔子就教导他的学生，诗、乐、人都应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文指文化教养，质指道德品质。有修养，彬彬有礼，内心仁厚，这样的人才才是君子。诗歌与音乐，文词美，旋律美，思想感情善，那才是到达了理想境界的上乘之作。稍后于孔子的孟子，则提出为人文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孔孟这种思想经我国历代杰出人物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生命力历久而不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应能“净化”人的心灵，贺拉斯提出诗应能“给人益处和乐趣”，即“寓教于乐”。作品要能教育人净化人，作者的思想感情理所当然至少应该是健康的。这种理论2300多年来经欧洲各国杰出人物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也早已成为欧美人的共识。生活在21世纪的一位语文教师，竟提出学生作文情思健康与否与作文教学的任务无关这样的观点，岂不是一种大倒退？

为了论证“无关论”的正确性，吴文反复强调学生作文与报刊文章（或叫“作家创作”）是两码事。“要知道，学生的作文并不是作家的创作。”“学生作文是个人表达，是一种极为私密的、个人化的文字，但求抒发一

己的感情和见解,它和那种发表于报章、杂志,旨在起引导、教化功能的文章是不同的。……学生作文……只求精神的满足、情感的快慰,不以影响他人为己任。”如此等等,看似振振有词,实则似是而非。学生作文与作家创作及一般报刊文章,作为精神劳动及其产品,都应该以“真善美的统一”作为衡量成败得失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因为学生与作家及一般人一样都是社会人;区别只在这个根本标准所悬的高度,就像跳高,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国家级选手、世界级选手面前,那横竿的高度是不同的;但不管高度相差多大,总得有根横竿,总得有个起码的高度,否则,跳高这项运动就失去存在的意义,等于被取消。学生作文也是这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要“思想感情健康”这根起码的“横竿”。学生作文虽然不以发表于报刊为目的,但至少要给第二个人——语文老师看。两个人就构成了社会,学生作文也就产生了社会影响。退一步说,就算学生用的是最私人化的文体,写的是日记,一辈子秘不示人,他的日记也天天在影响着他自己,他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又天天在影响着社会。再退一步说,学生作文今天“不以影响他人为己任”,明天他却要走向社会,他今天说话作文是明天说话作文的演习与准备。这道理是再明显不过的,怎么能以学生作文是“私人化的文字”为借口而放弃对学生习作的最起码的要求——思想感情健康?

以上评的是“无关论”。下面再评“无法检验论”。

为什么“作文无法检验学生思想感情的健康与否”?吴文的理由是:“学生迫于分数的压力”,会言不由衷说假话。诚然,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有时还闹得很严重。但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因为有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存在,就认为“学生作文说真话”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而学生作文永远“无法”反映学生思想感情的真实面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政治气候好、社会风气好、教师素质好,学生校内校外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教育与熏陶,写起文章来,说假话者就会越来越少的。

为了论证“无法检验论”的正确性,吴文又举言行不一的西晋文人潘岳为例,说明“文章与做人并无必然的联系”。从一切人的文章——自然包括学生的文章——都“无法”看出作者心灵的健康与否。这个例子很有名。(可惜的是,吴文引元好问的四句诗,竟弄出了四处错误。元好问原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吴文引诗“心声心话总非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败路尘?”)潘岳(字安仁)在《闲居赋》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位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高人,实际上

他却是个趋炎附势、巴结权贵的小人,例如,大官贾谧出门,他竟跪迎于道,望尘而拜。这个例子似乎很有说服力——潘岳是文章高手,人品却这样差,可见人品与文品“并无必然的联系”。其实,诸如此类的例子,只能说明衡人论文要“知人论世”,既看某人在文章中是怎么说的,又看他在生活中是怎么做的,再看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状况以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样做。据史书记载,潘岳文辞华美,所作诗文清新可诵,确是一代高手;然而,因为人品差,他只能成为诗文“名家”而成不了“大家”。这不正是历史“检验”了他的“文章与做人”之后给予的公正评价?再说,潘岳之流,毕竟是极少数。在绝大多数人那里,文品与人品是统一的。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文章是可以“检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健康与否的:这是为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规律和真理。个别的、极少数的例外不能动摇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得好:“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

在作文教学乃至整个语文教育中,我们应该坚持“真善美的统一”这个衡人论文的根本标准,坚持“思想感情健康”这个起码要求,而不可在否定被长期的左倾政治、左倾教育扭曲了的“健康”标准的同时,把本色的健康标准也否定了。这是语文教育中加强人文教育与取消人文教育之争,事关重大,不可不辨。

征稿启事

本刊“教学艺术”栏目继续向广大读者征稿。征稿篇目如下:

《杜鹃枝上杜鹃啼》《孔雀东南飞》《阿长与〈山海经〉》《琵琶行(并序)》《变形记》《麦琪的礼物》《将进酒》《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齐桓晋文之事》

行文方式不限,但要求真实体现教学过程中“艺术”的一面,欢迎个性化稿件。字数千字左右。

本刊编辑部

作文“说真话”面面观

李海林 任玲 小马

作文教学：“求真”不容易

任玲

还是从那次作文说起。

一个语文相当不错的农村学生在期末考试作文中揭露了他所在的乡镇烟草部门在收购烟叶时鱼肉乡里的事实,以一个老汉的不幸遭遇和无奈感叹表现了“低调”的主题。这是一篇考场作文,得分不高,学生不服气,让我看看。我知道改卷老师用心良苦,无非是提醒他慎对阴暗面。确实如此,一般学生辨识力弱,看问题不全面,认识不深刻,情绪往往偏激,要像成人那样巧妙(抑或是狡猾?)地掌握行文的分寸是很困难的。所以在作文教学中,老师总是采取避开阴暗面的办法,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面对一种不可回避的生活真实,我不能简而单之地把应试“诀窍”里的大实话告诉他而了结这个话题。我清楚,如果只是以主题“积极向上”来要求他,就等同于告诉他只有写“阳光灿烂”才是健康主题,而这显然毫无说服力。何况,如此说真话的作文比起满口假话骗取高分的那些虚伪之辞,不知要可贵多少倍!

于是我用了整整一节课来讨论这篇作文,给它以足够的肯定,目的是倡导“做真人,说真话”。师生间酣畅淋漓地对话,着实痛快。从此,“做真人,说真话”使作文中“禁忌”少了,“真实”多了。

正在喜悦之际,又一困惑袭来。

学生随笔中写到一件事,和母亲一起上街买菜时,看到一个小偷正拿着长长的镊子掏包呢,忙于抢购折价品的妇女全然不知。这个学生就很想过去制止,但被母亲拉住了。母亲严厉地说:“别多管闲事!”这位学生也只好作罢,但心里一直憋得慌,就和同学讨论起来。讨论的结果是:一、别人不管,你管他干什么?二、这年头,做好事惹祸上身的例子太多,别自找麻烦。三、小偷们都是一伙的,你势单力薄,对付不了。四、这样的事情多了,你能管多少?思考的结论是有足够的理由不再为自己的退避而自责了。

阅过随笔,我的心情很沉重,也很困惑:这也是真

话,也是某种“真实”。但如果我们就这么“真”下去,岂不是邪恶越来越猖獗,正义越来越无助?这世界还可以为明天留下几许希望?

因为我极力倡导“我手写我心”的文字,便以课下随笔的方式,给重重束缚下的心灵以解放的自由,让他们写“放胆文”,写真事、说真话、抒真情,并把它视为作文教学的起点。学生极欢迎这种做法,他们麻木已久的心灵动了,囚禁已久的情释放了,真心陪伴着好文笔喷涌而出,作文教学一度呈现鲜活蓬勃的局面。但慢慢地,我在随笔中读到许多难于释怀的悒郁和低沉的叹惋,甚至深受社会上盛行的风气影响,表露出来的是低下粗俗的真实,猥琐庸碌的迷茫。同时玩世不恭、得过且过、格调低下、言语粗俗甚至心底阴暗得叫人吃惊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那些大人可以狼狽为奸买官鬻爵,我们选学生干部不可以拉选票?为什么大人们可以明目张胆吃喝嫖赌,我们不可以恋爱?某人说一句稍稍“高调”的话,就被当作怪物,遭遇一脸的不屑。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导,总好像是说着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和学生的所做所言所想格格不入。许多人的真实心态是:这年头,信仰是什么玩意儿?除了钱,还有什么可信?

这样的“真实”,着实让为师者失望、难堪和困惑。我们不是倡导真实吗?我们不是反反复复疾呼解放学生的心灵吗?我们不是一直把说真话、做真人视为一个不可抛弃的目标吗?可为什么在学生把“真实”暴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竟如此不是滋味?进一步说,这样的“真”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境界吗?我们所说的“求真”,到底如何定位?真话、真人、真事、真情,等同于“真理”吗?

其实,教师的两难正在于此。我们希望学生写真话、真人、真事、真情,却不能回避“真”中暴露出来的价值取向。而作文随笔中的价值取向,显然又打着极深的社会现实印记,是社会畸形价值观念对教育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使然。明白地说,价值取向的问题,首先不是作文本身的问题,而是人在生存环境的外干预、个人成长的内建构下长期形成的观念问题,或者说,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不能抛开他们思想、情感的实际去

刻意灌输,不能强求他规定他必须怎样立意,我们当然也不能因为受不了这种真实而掉头回避。但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这样的真实。我们必须去引导,我们必须让学生学会坦然地面对,学会把问题思考得全面些、深入些。我们既不能扼杀他们关注社会的激情、感悟人生的愿望,又要让他们在认知、感悟、理解、思考中有新的超越。我们该做的,是潜移默化而非限制规定的引导,是润物细无声而非放任自流的滋养。

我要说的是,尊重学生真实独特的情感体验与滋养求真求善求美的价值追求永远不相悖。只是里面有一个限制与放松的“度”,有引导与滋养的艺术。为师者的角色和使命,使我们总是处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在真实存在与内心期望之间,在失望与帮助、支持、扶植一个生命成长的责任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文教学“求真”的路上,规定限制容易,放任自流容易,引导滋养最艰难、最重要,也最见教育者的真功夫。

评价作文的三个尺度

李海林

任玲老师在文章里提出作文的三个尺度,一是求真,一是求善,一是求美。所谓求真,就是说真话;所谓求善,就是思想境界;所谓求美,就是语言艺术。但是在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矛盾,说了真话,却可能降低了思想境界;文章里说的可能都是真话,但却不一定是美文。这里就涉及到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了。

要求学生在作文里必须说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其目的,一是道德意义上的,说真话与做真人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作文意义上的,要写好作文,首先要说真话,因为只有说真话才能有话可说,才符合文从心出的法则。但是,说真话只是作文的第一层级的要求,只是起码的要求,并不是好作文的充分条件。道理很简单,假的固然不是好的,但并非只要是真的就一定是好的。真与好并不相等。记得湖南有个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漂亮老婆,后来教育行政部门把这个老师开除了,有许多老师为他抱不平,理由就是:难道这个老师说的不是真话?于是又有一些老师站出来证明他说的并不很真,我们也有很多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他说的是真是假,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真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吗?有些老师之所以无条件肯定这位老师的这种读书挣钱论,其认识上的问题就是把“真”简单地等同于“善”了。

真不等于善,更不等于美,真善美是三个不同的标准,各有其自在的内涵。作文教学必须同时把握住这三

条标准,不可偏废。要求学生说真话是起码要求,但并不是所有的真话都是“好话”,我们可以要求学生说出来的都应该是真话,但同时也要告诉他们并不是所有真话都会获得肯定的评价,因为这种也许是真实的“话”可能是卑下的,也可能是不美的。不管是从作文的角度来评价,还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评价,说了不“善”不“美”但却是“真”话的作文,也不能算是好作文。

当然这样一来,又潜存着以教师的思想标准来规范学生的思想标准的可能。因为你说学生在作文中体现的这种思想是“善”还是不“善”,有价值没价值,标准只能是教师自己的判断。任玲老师谈到的那些思想倾向和现象当然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有些更复杂的思想可能不同的人评价就不会这样一致了,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以教师的思想标准来束缚甚至扼杀学生可能并没有错的思想,甚至是更高明的思想。于是问题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去了:教育的一些问题,最终都系于教师的素质上,归根结底还是靠教师的基本素质来解决。

以上是从理论上作一些探讨。在作文教学实践中,我又觉得问题并不是太难处理。说真话一方面考虑到了作文的伦理意义,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从作文教学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只有说真话才能真正写出有精气神的文章,从而解决学生是否有话可说和说得是否流畅痛快的问题。而精神境界问题、价值观问题,主要是从教育的社会性来考虑的,从作文教学的教育性内涵来考虑的,并不完全是作文教学论意义的要求。因此两相比照,在求真与求善这二者之间,最好当然是统一,但如果发生了不一致,取前者为上。因为以“善”为本,就会逼着学生无话可说或说假话,作文教学的目的本身就没法实现;而以“真”为本,则至少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作文教学本身的目的,则至少实现了一半。当然,作文教学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学生与这个世界通过语言交流、对话的一种心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求真也好求善也好,它们又统统要统一在求美上。美的作文,是最好的作文。美的作文,既是真的作文,又是善的作文,更主要的是,它是一种“艺术”的作文。这种“艺术”的作文,所谓“真”是“典型”的“真”,所谓“善”是历史的“善”。至于什么是美的作文,作文之美,其内涵、本质是什么,则是另一问题,需要作另一种意义的研究了。

附: “真”作文的标准与意义

小 马

第一,作文的“真”的标准问题

作文活动及言语成品,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借助文字

来传情达意的真实言语实践。拥有自身“真”的评判标准。

作文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言语实践,不一定须死死遵守社会道德与法律,有些应用文的写作其实是按作文设置的情境在“编造”,像写“通知”“倡议书”“感谢信”等等;这时的“真实性”,只能从言语形式是否准确地表达了要求传达的言语内容(包括设置的情境)来评定。这是由作文的教学性质决定的。教学就是模拟,模拟的东西就可以不是真实的。

作文也不同于文艺领域内虚构的创作活动。后者经常体现为极度成熟高超的言语表现技巧,是一个成熟的言语主体的实践活动,似乎可以说是作文的未来阶段,同时它还渗透着创作者敏锐深刻的思想和超凡脱俗的审美情趣;它采用典型或变形的创作方式,营造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和超脱感。而作文呢?它是一个不成熟的言语主体迈向成熟的必经的学习阶段,不仅言语表现技巧显得粗糙,而且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力也显稚嫩;这毕竟是一种模拟的言语实践。从真实性的方面看,它是一种间接的真实,对作文我们不应要求那种法律意义的“真”,即必须真实的发生。

作文的“真”也不同于哲学的“真”。后者是“获得了真理、达到了真理的境界,即主体在思想和行为上充分接近和适合于客体的必然性。这是主客体之间达到实质性统一的第一种状态。没有这种状态,人的活动不可能获得成功。”哲学的“真”是在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状态,强调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客观性,侧重于事实性判断。

作文的“真”,如上所述,产生在虚拟的情境中;这不是为了获得真理、达到真理的境界的过程(这并不是说作文可以违反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普遍规律)。在这里,言语表达过程本身就是作文的目的,是否为“真”,不一定由客观实践和科学的理论成果来检验,似乎是种由评阅者(教师)来确定的价值性判断。学生在记叙抒情类作文里,如果屡屡出现同一或相似言语内容的作文,即使其中存在着客观现实里确实发生了的事件的叙述,即使言语形式的选取各不相同,也很可能会被判定为“假”。在作文中,客观的“真”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谎言”(作文意义的“假”,即废话),因为它没有任何作文教学的意义了。

实际上,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同是评价“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二者的“独特性”更为重要。像《赤兔之死》,成为高考满分作文,不正是由于“独特”的言语内容(以物——赤兔马——反映人间事)和“独特”的言语形式(浓重的文言味)的完美结合吗?然而,其作文叙述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但有多少人产生了“假”的感觉呢?

表现为言语作品的作文的“真”更应该从言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密合程度来确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才是作文的“真”。

第二,作文教学中讲求“真情实感”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讲求“真情实感”的作文训练,与由他人设定言语内容、自己选择言语形式来建构言语作品相比,更为快捷便利,也更易于创作出优秀的习作。后者须经一个分析把握他人欲表达的言语内容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能去组织言语,才能去建构体现他人思想情感的言语作品;“我”似乎是局外人、以旁观的冷眼去完成,理智的力量过于强大,时时制约于已有的言语内容,是戴着镣铐跳舞。抒写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情意,是一个直接敞开心扉的过程,减少了中介环节,言语内容自然不需花费太多的气力去梳理,并且随着言语作品的展开,随着言语形式的选取,可以调整最早确定的言语内容,尤其是记叙抒情类的作文。

金圣叹曾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理论。他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在我看来,“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理论指出了写作过程里的两种类型:表现外在的人事物和表达内在的知情意。前者的言语内容已经基本确定,要做的主要是寻找恰当的言语形式使之言语化的过程;后者虽有一定的言语内容,但选取的言语形式与欲表达的言语内容之间可以互动(由写作时的情境确定),言语内容会在言语形式的影响下发生一定的变化,即如金圣叹所说的“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这样就具有相对程度的便易。处于模拟状态中的学生的写作,同样也如此。

在班级授课制的作文教学过程中,离不开一个较为整齐划一的训练内容和步骤,过分突出学生个体的主体本原的知情意的宣泄输出,可能会使整个教学变得不易控制。而预设一个共同的言语作品的内容,令学生调动主观自我言语世界去寻求最佳的言语形式,才能展现班级授课制的优越性。

因此,讲究命题的艺术至关重要,应努力使题目切合学生实际,使学生有话可说,在模拟性极强的作文情景中触动、激发学生产生真实的体验,升腾其情感,这样,言语形式的选择也会顺畅,最后的言语成品——作文也更出色。

(本文根据“韩军在线”相关讨论整理,请作者小马速与本刊联系。)

浅题深问的尝试

绍兴文理学院附中 俞乐女

探究性学习在阅读课教学中,很多时候表现为对教师提出的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学习方式决定了教师的教学方式要能创设探究发现的氛围,教师的提问要能让学生有探究的兴趣,有发现的可能。这样的问题就必须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同时又保持一个合适的“高度”,让学生的思维在活“跃”之后能“摘”到果子,品到“新鲜”“美妙”的滋味。浅题深问就是一种尝试。

阅读教学中,经常遇到一些看似浅显的问题,尽管重要,但往往为学生所忽视,我们提问时就要引导学生作深入探究。例如教《曹刿论战》,我让学生说说鲁庄公其人,学生略作思考,一致认为:他是无深谋远虑,不懂战略,既“鄙”且“愚”的昏庸之君。我并未止步,进而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大获全胜,仅仅是靠曹刿一人之功吗?鲁庄公作为最终的决策者,有没有可贵之处?”学生深思,比较联系,热烈讨论,之后便谈了以下几点:

1. 战前,打破尊卑观念的束缚,接见平民;2. 尊重人才,充分信任,交以指挥大权;3. 战时善于纳谏,及时调整战术,不武断;4. 战后虚心求教,不贪功。

而后我便从《史记》找来相关资料加以补充,引导学生把历史人物放置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进行客观恰当的评价,从而深刻全面地把握人物的本质;同时,也对历史上这一次著名战役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这里学生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几成公论,浅得很,似乎没有问题,稍不注意就滑过去了。但我们如果深入探究,就像这样“浅题深问”,学生才能自由地品读文本,有自己的发现。

从纵向的角度说,浅指的是难易程度的浅,即“肤浅”;然而,从横向的角度说,浅还可能指思维不够缜密,考虑问题往往脱离问题产生的实际背景,缺乏一种横向联系的扩张力,即“粗浅”。这样很容易形成思维的程式化,不利于学生养成研究性学习的习惯。这时,需要教师有一种认认真真的研究心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开放的观念,引导学生客观地多角度地看问题,养成凡事问一问、想一想的习惯。像教《孔乙己》,可以问一问,孔乙己到底值不值得同情?小说中有没有人同情他?教《小抄写员》可以问一问,如果父子俩第二天有机会面谈,他们各自会说些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说?教《心中的

鹰》,可以问一问,鹰的眼睛为什么会是“犀利”的?你在生活中可曾遇到过犀利的目光?这“犀利”的鹰的眼神折射出作者怎样的复杂感情?这样的问,充分激活了源头活水,让作者的情思如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过广袤的时空流到学生内心深处,并掀起共鸣的高潮。

坚持浅题深问,不仅仅是让学生养成一种良好的思考习惯,掌握良好的思维方法,培养重探究、勤钻研的学习品质,更重要的是学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能够从某一个角度独立自由地解读课文,形成读者、作者、文本的阅读对话。学生在这种对话中,解读欣赏文本,建构阅读意义;同时也形成了学生、教师、教材三者之间的教学对话,实现了探究、合作、发现的互动。

煮字

浙江湖州双林中学 沈晓龙

小时候,我是个无用且懒的孩子,村里的大人们曾不止一次地恐吓我说:“你这孩子将来讨饭怕都会没有饭碗。”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只知道捧着本书看,不高兴做家务割羊草,便常会大发脾气,骂:“懒汉,讨债鬼!字好当饭吃啊?”后来,我做了教师,母亲见我在学生们面前读读写写像模像样,便又时常在人前夸口说:“没想到我家阿龙真的把字当饭吃了!”

母亲的这句话,对她来说也许是自豪,对我来说却是鞭策。我理该多多读书,多多写字,多多作文,理该把这“字”给“煮熟”了。

几年前,我读《齐白石传》,邂逅了白石老人下面的一段回忆,倍感亲切:

余未成年时喜写字,祖母尝太息曰:“汝好学,惜来时走错了人家。俗语云: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朝无米,吾儿奈何!”后二十年,余尝得写真润金买柴米,祖母又曰:“哪知今日锅里煮吾儿之画也。”

穷人家的孩子长大而能“煮字”“煮画”,该是多大的福气啊!为我母亲的话,也为这福气,我决定叫我的练笔本为“煮字本”。

至于“煮字”的意思,我的解释有三。

一、“煮字”即“练习写字”

方块汉字要写好,写漂亮,必得苦练。可我读书之时根本无视这一点,所以字一直写得很差。工作以后,角色的转变迫使我发奋练字,我把备课本、作文本、笔